

变革抑或延续: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关系(1949—1978)*

李飞龙

家庭关系是指基于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而形成的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过这样的论述,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1]

在封建社会中,家庭关系与父系夫权的家庭制度相统一,家庭关系是以家庭为本位、以亲子关系为轴心的主从关系,体现了男女不平等和长幼不平等。家庭的代表是父系家长,名为父严、母慈、子孝,但实际上是男尊女卑、夫权主义、家长制度,妇女家庭责任感和自谦自抑的认同感被视为一种美德。而现代家庭关系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家庭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为基础,妇女的家庭地位、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五年里,就是家庭关系从传统社会依附地位向现代社会平等地位嬗变的过程。

一、农村家庭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各种家庭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夫妻关系主要表现在情感与性、家庭日常事务的處理和家庭外的社会活动三个主要的方面。总体来说,中国农村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夫妻关系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夫妻关系日益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主线。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夫妻关系的性生活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一是夫妻之间的生育观念要远远大于性生活观念,使得性生活在夫妻之间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二是性生活在农村社会中,是一个被禁忌和羞于谈论的话题,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既无法从外界获得有关的性生活知识,也不能向外界传递自身的性生活经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受现代观念的冲击,年轻人的性观念、性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些离婚案例中,对性生活的不满成为提出离婚的重要理由。

农村社会并不是把感情放置于婚姻的基础地位,离婚过程中所谓的感情破裂并不是指农村的夫妻双方没有感觉,而是因为夫妻双方没有承担本方应该承担的角色引起的。假如妻子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抚养孩子、照顾父母、勤劳善良,丈夫也会对妻子满意,在农村社会的网络中也会对妻子给予褒奖。丈夫把对外事务,重体力活都做好,妻子也心理满足。在集体化时期,夫妻双方一般都参加生产,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外界的诱惑也比较小,所以夫妻双方的生活比较平淡,也十分稳定。

李飞龙,男,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史。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YJCZH101)。

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夫妻之间的一些任务分工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传统社会,由于成年女人大多为小脚,所以女人主要负责洗衣服、洗菜、烧饭、帮婴儿洗衣、洗尿布、换衣服等,而男人则负责田里种地、修家具等重体力活。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女人也慢慢放弃缠足的陋习,开始参加到集体生产中去。如1950年新疆解放后,广大农村妇女在受到教育以后,开始参加生产,喀什、迪化、阿克苏、伊犁、焉耆等六专区及迪化市,即有49万余妇女参加了修渠、开荒、秋收等生产运动。^[2]到了集体化时期,女人参加生产已经成为人民认同的现象,因为仅仅靠男人赚取的工分不能够养活全家人。改革开放以后,男女参与生产的机会变得更加均等,在家务中,男女共同参加家务劳动。不过受传统因素的作用,女人还是倾向于洗衣、做饭等家务。

在传统的大家族中,一般都是男性具有重大决定权。但是,在普通农民家庭,即使是在传统社会中,他们也更倾向于互相协商,尤其遇到重大事情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家庭的生产安排、家庭各项重大支出等重大决策都是夫妻双方协商进行的,在这协商的过程中,可能男人的决定权会稍微大些,这体现了男人在家中的地位要稍微高于女性。

在家庭外社会活动中,主要的决定权在于男方,尤其是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参与中。一般情况下,只有妇女主任是女性,其它的都是男性。很大一部分农民认为,“妇女管家事能行,管国事不行,就是选上也得掉下来,不顶事。”“妇女做妇联会工作还行,当乡长、区长,领导全面工作就不行;那有妇女领导男人的?”^[3]即使是女人当上了村里的干部,她的丈夫也不会觉得脸上有多大的光彩,而如果是男人当了村干部,他的妻子会觉得很光荣,说话的底气也会硬。这也说明了男人在公共事务决定上的重要作用。

在工分上(集体化时期),也没有实现“同工同酬”,一般一个壮男劳力是10个工分,而一个壮女性劳力最多也就是8个工分,甚至更低。主要原有在于,一般情况下,在工作时,女性会提前半个小时回家做饭,而一些外出扒河等工程的工作也只能由男人去做,女人一是不方便,二是体力也跟不上。所以,在农村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习惯一直存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想也很普遍。

二、农村家庭的父子关系

由于封建传统的家族制度,是以父系单亲世系为特征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要延续和发展,传宗接代,没有子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农村家庭的亲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而处于家庭关系的核心地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选聘媳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延续后代,保证生育男儿是向算命先生明白提出的要求。如果当媳妇的没有能力完成她的职责,夫家就有很充足的理由将她遗弃而无需任何赔偿。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确认。同样,姻亲关系只有在她生育孩子以后才开始有效。”^[4]可见稳定的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最重要的因素。

在农村社会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始于生、终于婚。一对父母等到所有的孩子结婚以后,才松了一口气,算是完成了做父母的责任。在抚养的方式上,最主要的体现是“抚养——依赖”关系。在农村,婴儿的哺乳期限都比较大,浙北的Y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哺乳期少则一年,多则三年。^[5]从孩子和父母睡觉的方式看,农村中的孩子一般都要和父母睡到5岁以上,父母担心孩子自己睡觉会受凉。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喂奶、换尿布、哄睡觉都很方便。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主要也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如果做错事以后,很少讲道理,打一顿就能让孩子记住。

在亲子关系中,父母的重男轻女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时间存在,一直持续到今天,部分农村社会中,还是有这样的思想。解放前,溺婴主要溺的是女婴,这样的溺女婴事件在50年代还发生过。在教育上,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家长一般会选择男孩去上学,而让女孩在家中帮助父母做家务和农活。河北的L村有这样一个案例,吴大妈兄弟姐妹四人,吴大妈的母亲每年都要在两个女儿家分别生活3个月,临走前还要带走一些鸡蛋、肉和营养品,每当母亲生病时就会到她或者她妹妹家,让他们照顾,而病轻了又跑去吴大妈弟弟家做农活。^[6]吴大妈母亲这样为他弟弟考虑,主要还是认为女儿嫁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儿子才是自己的。这是一种发自本能的“重男轻女”思想。

父权的不断衰落和家庭的民主化也是家庭关系发生的一种趋势。费孝通所讲的大家庭的父子轴结构日趋瓦解。^[7]在传统社会中,父权具有绝对权威,子女在家庭中没有事务的决定权。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民主思想的推行、子女赚取财富的增多,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权开始衰落,子女的权利开始得到增

强。在集体化时期,个人对家庭财产的意识增加,使得父权进一步衰落。阎云翔认为这是集体化压制私人领域的一种产物,国家对这种年轻人对家庭财产的要求给予很大的支持。^[8]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子女的大量外出和分家现象的提前,父权在农村社会中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影响了对老人的赡养。

三、农村家庭的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就是女子通过与丈夫的婚姻缔结而形成的与丈夫的母亲之间的亲属关系,是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所确立的。婆媳关系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婚姻关系,又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以两种关系为中介构成的特殊关系。自从人类进入父权制社会以来,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婆媳关系是家庭结构中既重要又特殊的一组关系。婆媳关系既涉及到女人与女人的关系,又涉及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不仅包涵着社会文化因子,而且有着微妙的心理因素。^[9]

在封建社会,婚姻缔结完全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行,“娶妻如何,必告父母”就宣告了婆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就已确定。民谣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新嫂嫂,脚儿小,才来三天就上灶,弄得东西味不好,惹得公婆都恼了,公一棒,婆一鞭,打得媳妇泪涟涟。”^[10]这是封建时期,媳妇的地位的反映,等到媳妇做了婆婆以后,新婆婆也一样对新媳妇,所谓是“十年媳妇熬成婆”,所以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婆媳关系是“媳弱婆强”。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会的婆媳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变,媳妇地位有所提高,婆婆地位有所下降,婆媳关系逐渐向“媳强婆弱”转变。这种转变有国家政策支持、经济地位变化的原因,还有就是农村干部的调解作用。由于农村社会中集体经济的建立,出现了以协调为中心的农村调解机构,它不仅负责调解农民的离婚问题,更重要的调解农村社会中纠纷,包括家庭纠纷。一旦发生婆媳纠纷,或者说是婆婆虐待媳妇,媳妇对婆婆不好,村里的干部就会出现进行协调,直到化干戈为玉帛。不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农村家庭的婆婆表现仍然强势,常常给媳妇气受,在南苑的一个村庄中,有600户家庭,其中给媳妇气受的就有30户,这些婆婆不给媳妇做件衣服,有些婆婆看见儿子媳妇的关系好,还经常的挑唆儿媳关系。个别的妇女常受婆婆打骂,不给饭吃,这个村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常被虐待,被婆婆、丈夫、小叔打骂,在1953年投井自杀了。^[11]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儿子地位的提高,媳妇的地位也逐渐超越了婆婆,婆媳关系转变为“媳强婆弱”。随着儿子和媳妇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婆婆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丧失,甚至有的被赶出了家门。这一时期,农村的基层政权也不能像集体化时期进行调解,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这种功能。在黑龙江的下岬村,教了几十年书的李老师夫妇,因为孙子的满月酒问题,发生争执,婆媳吵了起来,然后分家。一年以后,李老师夫妇被赶出了家门。^[8]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社会,媳妇的地位已经明显超过了婆婆。

婆媳关系的关键是儿子。如果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低,或者说儿子没有主见,很难把婆媳关系处理好,就会夹在婆媳之间,十分被动。如果儿子能够在家庭中地位比较高,媳妇和母亲都会参考儿子的意见,婆媳之间的矛盾也就比较容易处理。农村里有句话说的好,“媳妇的本领都是儿子给的”,没有儿子的支持,媳妇的建议也很难得到实行。在70年代末期,年轻男女结婚时开始筹备他们之间的小家庭时,儿子往往怂恿媳妇往自己家里要彩礼,表面上看是媳妇的意见,实际上是儿子的意见。

四、变革与延续: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家庭关系

社会变迁和社会延续是分析农村社会的不同视角,这两种视角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社会的家庭与婚姻中都有所体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在建国以后的三十五年内相互共存,社会变迁中的变与社会延续中的不变一直交织于整个农村社会之中。

家庭的变革。集体经济的建立,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使得传统时代家长监管财产的范围大大缩小,也就使得家长对家庭成员的监管能力减弱。这样复合家庭大大减少,加之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复合家庭到改革开放初期基本上消失,农村中的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在家庭关系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子女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五年就是夫权不断丧失,子女不断独立的过程,民

主的思想在家庭关系中不断发展。在妇女地位的问题上,美国学者马克·赫特尔把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归因于四个重大的事件:一是1950年公布的婚姻法;二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得男子在家庭中的特权不复存在;三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四是改革开放的影响。^[12]这四次重大的变化,都是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和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从而使女性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家庭的延续。与社会变迁相对立的是社会延续,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五年里,家庭的一些元素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如,家长在子女婚姻问题上还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权。传统社会的从夫居仍然普遍存在,招赘婚姻仍然不被认同,如果出现招赘婚姻,很多女婿需要结婚时对岳父母有永不分家、为岳父母养老送终的承诺。^[13]农村社会中的血统延续和财产继承仍以儿子为主,同时儿子也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和养老义务。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的传统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婚姻礼节上,不论社会如何变化,婚礼都在一定形式上得以保留,并通过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家庭中的不变因素大量存在。

宗族势力的长期存在。在宗族问题上,农村中的宗族势力在一定形式上长期存在。在私人土地所有制和以儒家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受到极大冲击的情况下,农村的传统的农耕方式还在延续。韩敏女士所研究的皖北李氏宗族仍然可以靠居住、祖先祭祀、家谱维护和命名系统等制度来维系家族的整体性。^[14]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传统的宗族意识、宗族功能和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它仍然以潜在的形式延续着。^[14]弗里德曼指出,在广州和福建那样经济富裕的地方,宗族和它的分支大量地拥有土地,这些共同财产是维持形成大宗族的关键。波特夫妇分析了香港新界的唐氏宗族的兴旺原因,并同广东、福建、河北等地区比较之后,认为,“当然也有其他因素,如劳动互助、保卫、名誉以及使中国的族人产生连带感的感情。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是集体共有族产的经济引力是维系大宗族组织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条件。”^[15]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五年的长时段看,农村中的宗族结构没有本质上改变。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 胡中. 第一个充满欢笑的新年,记新疆农村一年来的新变化[N]. 人民日报,1951-1-9,(1).
- [3] 李纪阳. 动员妇女群众积极参加普选运动[N]. 人民日报,1953-6-9,(3).
- [4]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 [5]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 当代浙江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6] 刘中一. 村庄里的中国——一个华北乡村的婚约、家庭、生育与性[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8]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 [9] 刘传霞.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婆媳关系[J]. 东岳论丛,2004,(2).
- [10] 牛敬忠. 从民谣看儒家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影响[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 [11] 郊区农民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Z]. 北京市档案馆,缩微档号:084—003—00028.
- [12] (美)马克·赫特尔. 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13] 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 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与社会后果:来自三个县的调查发现[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 [14] 韩敏.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 [15] Potter, Sulamith Heins and Jack M. Potter: China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责任编辑:王建平